

## 會後感

野思想的可能性\*

張立本\*\*

## After Forum

Possibilities in Those Undisciplined Thoughts

by Li-Pen CHANG

---

\* 感謝許雅斐、陳竹上教授商榷部分內容，並糾正錯誤；亦感謝郭耀中對全文提出懇摯的建議。但最後的詮釋文責仍是我的。

\*\*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通訊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E-mail: ohwhat.city@gmail.com

## 一、引言或託辭

這是門苦差事——雖然不是第一件差事。談「思想體系」太嚴重，做為思想研究的初入門，我僅能淺談兩天研討會的心得，盼讀者「同情的理解」。

即便當成自我訓練，顯然也難成功，因為議題太豐富。除了大量社會工作實務、政策，還有左翼與歷史或左翼重建、重讀《台灣文化》月刊，以及原住民、土地問題，和在台馬華學生的自我反思，大陸方面關於青年狀況、影像、社區的題目……。<sup>1</sup>但還是得硬著頭皮，除非我們都認為當前社會沒什麼大問題、安居樂業公平又和平，否則，時時反省自身意識，當是從事知識與實踐活動者的共同要務吧？故我仍基於所聽、所讀的感覺，提出商榷，但請勿認為我嘗試「總結」各家，而是詢問你我共同的命題與侷限。

## 二、提問：「到」在地歷史解釋的合法性

我試著從年會主題開始思考：「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並且，也嘗試呼應開幕講詞，看能不能展開討論的連續。我（個人）接受如此定題，因我將之視為一提問，直面我們對當前現實感到的焦慮、困頓，從而對自身知識與實踐感到困頓、懷疑。雖然就字面而言，與「社會學本土化」似有相近，要求檢驗知識紮實台灣的狀況，或本地議題研究之充分與否；但從對抗的角度，也許是質疑：規範化了的知識體制（基本源於美、歐<sup>2</sup>的知識體制，並進而規範了台灣的體制知識）解決了什麼？我較親後者，即「『到』在地歷史解釋」並非「社會學

1 本文提及的會議文章，請參考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相關之年會材料，及學會網站(<http://cc.shu.edu.tw/~atss1/>)。

2 且，所謂「歐洲」基本不包括前蘇聯等赤色範圍。

本土化」的同義反覆，而是感覺知識失去有效性——大至處理民主問題，小至批判日常關係——亟需返回檢討知識本身。若更抽象來談，也許還可說是逼問自己尋找真問題的能力。

知識幫助我們理解現象，亦同時具備阻礙我們前進的作用。但思想非僅工具，它可表現社會的豐富，也期盼鼓舞社會的積極與豐富。故目的不在單純「拋棄」既有的東西，而是懷抱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期待社會維持批判動能、持續釐清是什麼阻礙我們向前？在這樣的精神準備中面對知識（「知識」是名詞亦可是動詞）可能的瑕疵。卡維波（甯應斌）教授在開幕演講〈人民民主20年後的尋思〉也提到台灣知識份子的困境，他認為「台灣知識份子誠然因為解嚴後的本土社會運動而有很好的知識位置，但我們的理論資源幾乎都來自西方，而且自滿於『全球在地化』的那個『在地』角色，然而，我們需要的卻是發展競逐性的另類知識體系、與西方知識體系交鋒，自身從局部地方區域性的知識與價值透過歷史走向普世，同時也把西方歐洲『地方化』」。除了同意卡維波教授所感，我認為知識指向的事物也需加重強調，即我們究竟期待什麼樣的未來？如何解決現實中阻礙邁向更好未來的因素？

由於我無法說得比幾位更多，就此打住，待後文闡述。但「在地歷史解釋」不僅不是字面上「針對本地現象、通過歷史提出解釋」，還要知道這不是新命題。從不滿之感進而自我質疑，進而要求歷史地、現實地、本土地尋找解方，這樣的大命題，最近一次於1970年代中期就曾大光亮，是當時知識、文藝、實踐圈的核心議程。<sup>3</sup>因此，命題與思

3 1976年創刊的《夏潮》雜誌，自其改版而開始標榜「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此核心問題意識即於當時的廣義批判圈迅速蔓延。因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很難全面列舉；但其實也不需要一個不漏，因為當時處於積極狀態的社會狀況較之今日相對具有聯帶感與通性——可惜還未見到針對彼時思想富裕狀態如何演變至今的有效研究。不過還是可以稍舉例，如：1978年3月號《雄獅美術》提出「文藝的、民族的、現實的」改版宣言、1978年3月《仙人掌》雜誌第12期的《民族文學再出發》專刊，乃至1981年5月《台灣文藝》由鍾肇政主筆的「每期的話」提出「從鄉土文學到民族文學」等，基本顯示了批判圈（知識的與實踐的）對社會現狀的急切、不滿，或焦慮、慎思……。

考之反覆出現，由於糾纏了每個「當下」的社會狀態，故涉及歷史性。這暗示在不同歷史時空的相似提問之間，也該更關係性地理解；且或許70年代「大共識」逐步破碎的歷史本身，與當前失去了有效性的知識狀態之形成，亦是脫不了干係的。

先舉我所聽到的其中一場發表以為鋪陳。我還沒聽完就已覺得精彩。主講者是在花蓮奇美部落做了8年工作的吳明季，向我們介紹這個「山裡的」阿美族部落（不同於普遍認知阿美族都是「平地」部落），如何至今保持許多「傳統」。特別是年齡階層的社會關係，嚴實地扮演了傳承、延續部落倫理的功能。我們聽到年齡階層的重要，但成也因之敗也因之。由於外環境變遷（如直銷入侵），年齡階層曾使得個人迷惘成為整層、世代性的；但也恰是此種人際關係的保存，構成了基進組織者介入的契機。做為外面嫁來的人，吳明季的工作有賴這個傳統，轉變可以是片狀的。例如她說，有次想做一件事兒、先說給公、婆聽，公、婆立即以自己的經驗告訴她，什麼動作會產生什麼麻煩，所以應該先對誰說、如何說，然後就可將話傳開並引發效應，事情才會成。

我非常興奮，顯然，將「部落老人家經驗」理解為生活、人與自然的關係，或，暫稱之為文化，只是我對原住民議題的膚淺理解。老人經驗竟然也可以是政治分析，是組織方法。「年齡階層」更讓我感受到不同的團結方式與社會關係：在以之為軸心的部落中工作，吳明季學習到的「部落工作最好是找一群人一起做」，使老人所說的「自己提出的事必須自己承擔後果」，具有豐富的責任與倫理面向。我直覺想起Clastres（1987）曾在《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描述部落頭目由於其權力位置相應著照顧族人的責任，故經常把家裡的東西送給上門求助的族人，使得頭目的家往往是最好認、最破爛貧窮的那個；Clastres藉此質疑現代國家(modern state)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間的關係。「個人責任」反映了「現代性(modernity)」的關注，只是，回到奇美部落的例子，西

方現代性將如何看待「部落傳統聯帶或父權關係」？奇美部落又能對西方提出什麼挑戰？暫不論斷，但吳明季發表的內容，確實豐富地觸及了「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的企圖。

### 三、例一：政府與人民的二分法

「反思西方理論、反省臺灣的全球學術分工位置、跳出當前的規範性知識或理論……」，究竟意謂什麼？如何「不是」替西方學術帝國提供個案解釋？最簡的提法是反省使用理論的方式，但這麼說等於沒說。

是什麼阻礙了我們？研究倫理第一課都知道，從選題目、尋求經費，研究者無時不受主觀之影響。所謂主觀，有時也是學科內在的政治性。理論本身所鑲嵌的世界觀與社會背景如何先決了研究視野？如今已不是新鮮的故事。以我較熟的都市研究來說，至今仍佔核心學術位置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便是一例，經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的討論，已可辨認其起源美國戰後工業發展年代的背景，將剝削關係暗藏在各種現代化不適應症、偏差行為等敘事方式中(Castells 2003)。以科學理性為名，分析概念或分類範疇亦往往為著掩飾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美、歐的理論資源為何如此觀看？解釋世界？這有待批判，但我們又何以將美、歐規格做為自我理解的預設？美、歐思想與理論如何**歷史地成為**我們的前提？我們問題意識的前緣是如何結構起來的？

「台社學會年會」的議題歷來多有批判性草根實踐意味兒的子題，今年亦不例外。總的閱讀感覺，是許多批判視角都暗藏著「政府vs.人民」的敘事思維，不僅暗示或明示權力不均之「兩極」，甚至可無限自我生殖——諸如統治者(政府、國家、公部門等)vs.被統治者(社會、人民、民間等)的**模糊**二元對比。是否因為實踐傾向所致？各篇論文自有其文脈，以政府為批判對象(無論意謂著政策的發佈者、體制、法律

及行政規則等，暫不極盡列舉）、並對應人民之政治正確，然而何以構成此種敘事方式？正是待展開討論的現象。

比如今年非常重要的場次〈反學術霸凌—事件與行動〉，飽受不公的當事人現身說法，指陳「學術審查」的荒謬。其中，許雅斐教授102年度審查結果為「未通過」的專題研究計畫，其審查委員二的意見內容竟有過半抄襲自該計畫及另一件許教授已執行的研究計劃。合理的申訴理由卻因國科會拒絕回應而無法平反，足以表現各別人們面對制度性機制時的渺小。在當前體制與社會氣氛中曝露這樣的現實，其實需要相當的勇氣。審查機制可議且可疑，然而，即使具體現象是專業學術審查演變為司法案件，卻難以「人民與政府訴訟的過程」來解釋。事實上，當事人關切的亦是隱藏在「人人平等、制度公平」下的權力不平等現狀。<sup>4</sup>那如果「體制(政府) vs. 受體制之害(送審者)」不足以解釋，又何以成為我們的思考方式？本次會議還有更多論文直接以「政府 vs. 人民」或其他二元邏輯做為批判視角，值得反思。

政府、社會(或人民)，都是現代性社會學的重要軸承，理解其理論起源、孰輕孰重的歷史變化過程，<sup>5</sup>自是理論研究不可逃避的環節。但政府、人民做為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並不使「政府、人民」成為不證自明的主要研究對象；即使從左翼角度，當前的現代國家就是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亦未全然合理化「政府」如何成為台灣社會學研究之重要對象。我目前僅能如此構想：「政府」之所以堅固地成為批判對象的此一(台灣)現象，不只涉及「政府」乙詞的社會學重要性、不僅由於西方理論的傳統，而是一**特殊歷史現象**。如此便令我侷促不安，「概念」通過什麼複雜過程結構於我們的意識中？必須從台灣社會狀況進行理

4 以此論壇為例，並非質疑運動正當性。剛好相反，恰因真實存在不平等，更該商榷「人」如何躲藏在權力機制中？政策承載者、體制的執行者，直言之，即論文審查人、決定如何回覆的國科會成員，就是你我隔壁的同儕、社會的一部份、甚至好友，是……；我們如何讓這些「人」負起責任？將這些人定義為「政府」，顯然是不夠的。

5 參考1980年代中期，Peter B. Evans等人編著〈Bringing the state ack in〉的前後脈絡。

airiti

解，而一層層、一歷史階段又一歷史階段地，清理當今知識方式之形成。

目前對台灣「歷史—社會」狀況的理解約莫是：在長期戒嚴中經歷思想鎮壓，雖然肅清中仍因著時代變遷而有異物冒現（如1960、70不間斷的白色恐怖案件、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但主要在1970、80年代之交那十年，思想活動才烈火復燃，到了80年代中期即解嚴的末端，有黨外，繼而「黨外」板塊因統獨問題產生劇烈變動。我們於是也在80年代看到海歸學人引入的「新馬（Neo-Marxism）」快速將當時「黨國」等關鍵詞置入批判，從而也替「民間、社會、人民、草根……」取得政治經濟與社會批判的重要位置。上述理解中，人們之所欲、西方理論、台灣的現實政治、思想等，基本揉成一塊兒了。不能說當時的理論引介全然無效，也不是說今天的話語便是當初的複製，但重要的是，黨外政治活動與學術理路與社會壓迫現象之間，產生了複雜的甚至是偶然的耦合關係，從而影響今日。70、80年代的思想豐沛不容否認，但同時要承認，今日無論生產關係上的受壓迫者、社會邊緣群體、保守衛道團體，都能高舉「人民」的名義上街抗議的現象，毋寧瓦解了「人民」的絕對正當性也使「政府與人民」之對峙關係失效（如今政黨可以化身人民，而受壓迫者變成了多元中的少數；資本家的角色也在批判黨國的社會過程中抽換了「民間」，從而使「民間」失去階級批判性），但我們卻尚未清理這段歷史性的思想狀況，及其在什麼社會變動狀況中來到今天？<sup>6</sup>何況1990年代除了內島變化還有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變動。這是思想狀況的困局，知識狀況的歷史性，且包含無意識。

「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僅為一例，我相信細緻觀察必能發現別的預設。我也先不評斷孰是孰非，就理論層面先談到這裡。可是我之所以

---

6 有關「民間哲學」、「民間社會」論，可參考1987年《南方》第8期等、1987年《前方》五月號、六月號等之相關論辯。不過問題不在於贊成或不贊成，而是如何釐清人們歷史的、複雜的狀況中進行爭辯？爭辯過程又揭露了什麼樣的思想議題？

用這種方式拉出議題，除了由於我認為需要「歷史化」地理解今天的批判武器、我們所使用的知識，也因為我認為「歷史化」可以還原「政府與人民」之間非天然政治正確的複雜關係，並且，還由於我懷疑以此種論說方式面對現實問題能否走下去。包括：自由主義多元主義之謂「人民」已與左翼所談的「人民」混淆不清、無論期待奪取政權的左翼，抑或無政府主義者，終將面臨人與人如何組織起來的命題等。政治組織做為社會之派生物，終究得回到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這樣的問題上，而政治經濟權力也恰是透過官僚化、異化的「人」自身（辦事員、政策執行者……等），也是「人民」。

我們嘗試解決問題，同時會不斷遇到困境。有時我們感覺解決了困境，但真的解決了嗎？另些時候，恰是因為不自覺的使用了某些取徑、限於現實的形式化表象，而迅速收編、瓦解了思想的可能性，甚至造出新的誤區。我們必須更複雜的思考困頓的起源。

#### 四、例二：歷史與歷史化之困難

接著我想直接針對「歷史化」<sup>7</sup>提出思考，但只能談第一天的其中兩場。首先是〈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歷程、頓挫，與超克：20世紀以來的運動者及其思想〉，發表人有許育嘉、邱士杰、張鈞凱；第二場是〈從左翼（國際主義）觀點思索台灣〉，有林柏儀、陳柏謙、胡清雅。我當然無法在此對6篇文章一併論斷，只想拉開討論，向6位基本與我屬於同代的同儕們做商榷。

6位發表人都嘗試從過去的論著中尋找解決當下問題的可能性：林書揚、陳映真，及更早的古典馬克思論述；胡清雅則複雜些，她嘗試清理80年代「人民民主論」的起源、演變，及「人民民主論」在目前的

7 我想談的「歷史化」工作不指一般的「歷史研究」。這不是說一般歷史研究沒價值，而是我想聚焦於，為了解決眼下之困局、關切知識之當前有效性的「思想資源」探索工作。



後果與影響。坦言之，針對林柏儀、<sup>8</sup>陳柏謙<sup>9</sup>所做的報告，我較理解為知識上的澄清：澄清「左翼」固有的、對於民族問題、民族主義的看法。但其重要性更在於脈絡地理解兩位的討論，實與近日針對「兩岸服務業貿易協定」的一連串來自社會運動圈的反應有關。<sup>10</sup>因此，即使將林、陳的發言視為第一步，反映在日後的推進時，由於其關懷的現實性，也就涉及思想討論如何更廣泛的集體介入？而不單是兩人自己的工作。對比之，邱士杰、張鈞凱探尋的，則是台灣知識份子針對台灣社會狀況所做的知識整備；邱士杰針對社會性質論，張鈞凱則對焦林書揚與「新民主論壇」。以我的想法，邱、張<sup>11</sup>兩人的工作也還需要持續推進。

我想以邱士杰的工作稍微延伸。邱君所提是少見、針對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概念演變所做之系統性研究，<sup>12</sup>但——邱士杰也提到社會性質論中曾貼近台灣經濟現實的「半封建論」逐步脫離台灣的現實。我便針對此，以拋出更多疑惑的方式進行展開——如果陳映真的社會性質研究工作並沒有在初提出時即產生陳映真所設想的作用，那麼今天要如何使之產生「我們」所期待的作用？我所擔憂，在於能以什麼方式維持思想本身的問題性？當我們面對當下之遭遇，而歷史地汲取思想，無論想使之適應當前、為我們所用，或因其失效而須割棄，我們

- 
- 8 林柏儀是重新思考馬克思、列寧與托洛斯基思想，特別注重超越統獨認同，題目：〈左翼國際主義是什麼？兼論對台灣的可能啟示〉。
- 9 陳柏謙嘗試重新處理古典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主義或民族問題之態度，題目：〈民族主義還是國際主義？找尋列寧民族主義／國際主義觀的當代意義〉。
- 10 參考苦勞網 (<http://www.cooloud.org.tw/>) 有關【兩岸服貿協議】系列文章，可看出陳、林、胡等人的知識探索並非單純「理論上之興趣」，而是為了因應現實問題所做的備戰。
- 11 我感覺張君之文，意在積極挑戰台灣於冷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對於「民主、自由」之理解，故藉林書揚對「民主」之思考提出挑戰。積極對現有「民主、自由、人權」概念進行奪權是重要的，但請諒我於本文略過。其題目：〈「民主」內涵與實踐的再認識：以林書揚與「新民主論壇」為思考契機〉。
- 12 邱士杰曾於2009年提出過一個較早的版本。

如何主要顧及跨越歷史維度的知識有效性？我理解陳映真無時不在高度精神張力狀態下，為回應社會現實，故構造批判性的知識取徑，且由於反覆因應現實的變化因此不斷修正其分析。我將之理解為實踐性的、在應戰過程中產生、從現實緊張中產生的知識，從而也就是動態地、從「對應關係」中產生其意義。那麼，欲借之以衍生有助今日的方案，似該還原各個環節，甚至透過陳映真所對抗的其他論述、觀點，複雜化其發問，以更完整的歷史化。

容我多提，台灣於70年代後發生過多場論戰（如鄉土文學、中國結與台灣結……等，陳映真幾乎都參與其中）。有效的論戰往往高度捲動思想爆發，因此可以透過論戰掘出許多高規格的論述，但同時可能忽視未能完整論述的另些思想爆發。許多東西或在當時因不被理解而不受重視，也可能漏於事後整理之外，從而逐步拋出思想史；也可能因於現在的要求，形成某些歷史化的方式，繼而使原本充滿差異的狀況變得整齊，從而發生遺漏。綜言之，思想之重要一則雖在論述的完整性，但另些不能（無法）系統性整理的，也可能蘊藏著可取、恰益於我們此時的想法。這當然是非常複雜的工程，究竟怎麼重建歷史現場？進而面對我們知識方式的過程？但「還原」的重要性也是考慮避免反覆翻案，或詮釋權爭奪。這是我目前思考「思想的歷史工作」如何助於當前有效性的困惑。

前一節已提到，我們的問題之一是面對並反省自身的知識位置、知識方式。因此，亟需的工作就不是簡單挪用夠新、夠基進、夠顛覆的理論工具。面對龐雜的資源庫，也需要理解歷史中的人們怎麼想事情？如何構思？為何想這些？特定論述意圖解決什麼樣的問題？而放回今天，我們的知識感覺又為何？我前一段所想，在於現在的知識感覺會影響我們理解歷史的方式，更複雜地看，面對歷史中人們的思想而欲汲為資源時，必然也面對當時的知識感覺，從而也必須對之清理。說到這兒覺得甚為可惜，卡維波教授於開幕演講展示了他如何由

於今天感受到的不足，而反省其於80年代所提出的「人民民主論」及當時的問題意識，而胡清雅處理的恰好也是這部份，但兩位的發言還待更深的對話。

最後稍微談談許育嘉從陳映真小說〈蘋果樹〉做出的發問，他指出：台灣左翼由於尚未進行自我批判的祛魅，從而在「中國問題」上產生足以消解做為一個整體或主體的可能性與現實性。我認為，這裡藏著包含許育嘉在內前述6人的潛台詞：對民族「問題」的焦慮與不安。可惜我們還只是隔空對話：統獨問題不因兩岸交流而黯淡，反之，反共的冷戰意識形態持續蔓延至「仇中」，而「台灣、中國」則仍然讓我們感覺對應地成為不斷綱昇道德位置進而壓制了階級問題的範疇，在美國重返（從未離開？）亞洲、大陸資本往全球開放的今日，在台灣的左翼如何是好？我們顯然都從不同的面向表現出擔憂，卻還不足有條件「如過去般」公開談論。這是我感覺，不只亟需重建1940、50、60年代思想鎮壓的歷史，1970、80年代思想爆發過程亦同等亟需重建與清理。因為今天所知的「台派（未必明舉國家獨立）」、「非台派（未必直接是統派）」之爭，緊緊牽涉思想澎湃後的大分裂；今日思想、知識實踐的困頓亦高度牽涉了這段70、80年代的過程。我們需面對這段感覺經驗，但換言之也意謂著，若果真在今天感到思想的困頓、左翼的困頓，必須面對左翼自身亦參與其中的左翼頓挫史。

如同「理論」的使用不該將事物回收到既定分析架構與世界觀，歷史化也需確認沒有犯了再次快速回收到既定認知方式，而忽視了複雜性、遺失可能性。戮力清理，還不是因為台派或統派什麼的，而是因為困局。存有誤區的視野、扭曲的東西，就在眼前——無條件且扁平化的反共、繼承國民黨與冷戰意識形態的反左、毫無反思的親美日、無法反思的繼承美國的帶有侵略性與暗殺事實的所謂自由民主……都是夠直接的例子——可是它確實具備有效性（不是說解釋上的有效性，有效性也可以是動員的有效性等）、席捲日常生活，但左翼的下一步是

airiti  
什麼呢？

## 五、代結論：野路子——實踐角度的思想工作

最後講實踐的問題，也算是代結論（但不是前一節結尾提問的自問自答）。多談點「規範之外」，我想到個概念叫「野路子」<sup>13</sup>。什麼是野路子？以唱歌來說（或許任何存在「專業」的事物皆同），專業歌手有其訓練方式，或方法，教導發聲、表達的技巧，以「唱得好聽」。但我們偏不能說那些沒經歷專業訓練者唱歌就不好聽。如果延伸至「研討會」，就像某些形式如寫作格式，或技術細節如時間控制、事先上傳講稿等；有時反因假定了「學術性」，方要求、自我要求、想像某些當前學術環境的默會。但絕對無法取消不符「規格」之發表者的講話內容重要性。

野路子是對照「規範化」的另類想像，雖不意謂解決。在目前的環境裡，英文期刊至高無上、評鑑以求效益、大學「職前化（值錢化？）」、教學契約非正式化與不穩定……我若繼續講下去也滿危險的。雖不知該如何，我卻願意說，就以野路子為理由，「台社學會」的論壇值得我們期待。因為在日益強調「理論與實踐（實務？）」的氣氛中，還沒看到其他場域有此種形式的討論會，將高度理論化與抽象的，同尚未整備完成的，放在同一個平台、有一樣的地位。我們都知道世上有許多需要關注的場域，甚至應立即介入鬥爭，無論稱謂（百姓、民間、在地、弱者、底層、政治……），亦無論其方式（街頭衝撞、思維的或審美的論辯……），然而，正如知識份子有精神困境，具體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任何人們亦必然遭遇困境。比起知識份子易於宣洩且更容易被看見，「野路子」卻往往不受重視或難以表達。但若談

---

13 野路子不是我自創的，最初是在「中國好聲音」聽到的。「中國好聲音」是大陸上一個歌唱比賽／表演節目。

「在地解釋」，除了自身的知識、學術、思想的理路，也還要觸及那些不能被好好地收納的語言、思考，或表現，供其持續現身的場合。再說一點，野路子本身也允許更多撒野和歧異，比如，社會運動可能有不同的形象或內涵，得避免簡單回收到既定認識，如無政府、虛無、後現代；同時，野路子不是簡單的體制外，或規範外，它也包括我們如何自我刺激、嘗試理解某些難以用既定分類進行定義的「規範化之內的無規範（或如本文）」。

從本次會議來看，值得談談〈漂泊一代：當代中國青年身份認同〉場。我同意卡維波教授在開幕演講的提示，他說「大陸的中文系之知識系統基本上不是西方主導、是不同於西方學術的另類知識實踐」。我則感覺〈漂泊一代〉發表的「中文系」博士、博士生們，除懇切探問當代青年的主體狀態，其歷史地、社會地、現實地方式，不僅追問了漂泊（漂泊感、主體狀態）何以形成？也帶有向前反思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潛力。在「漂泊」此一問題的表層下，作者們試圖把自己置入思考的範圍，因此展開了「文學系」知識社群追索「主體感受」的新線索，亦帶有從自身擴及大範圍政治的可能性。我不曉得〈漂泊一代〉之主題是否是大陸中文系的常態，但顯然是台灣中文系所未見。是故強調野路子也就不等於完全從弱者的視野出發、高抬邊緣者的正當性，也不是追求混亂。做為具有運動性格的關懷，若不願意用社會運動這個詞（避免從規範化的社會運動理論理解），那就說是為了更公平、公正、和平的社會變遷途徑，此種關懷，則百姓、常民的處境，普通人如何感受世界？坐在會議場內的人們又是否暗暗摀下了唯恐不合規範的想法？也許都該是「思想狀況」的重要面向。基於期待社會底內蘊表現出應有的豐沛，而思想性愈豐富的階段可能在於混亂、不知道怎麼寫、無法被歸類到既有規範性範疇的階段，便該重視那往往以未完成的面貌進行中的活動（但又別將我這兒的「未完成」回收到解構主義了）。

最後還是回到奇美部落那場，主持人夏曉鵬教授開場時提到，「表

面上實踐者回家，卻不一定真的是回家，也未必回得了家(按：此為大致語意)」。此「家」我理解為「民間」，那麼我們還是得不厭其煩地提醒，回到民間並不意味著民間應有政治正確。對象不是不證自明。我不能不預設此防火牆，即使期待思想得以允諾未來，卻總得面對思想內在地殘留、誤區、無意識等不利於前行的部份。如何歷史地清理自身、辨認自己的扭曲，也是最難的部份。

2013年10月6日 初稿

2014年1月12日 終稿

#### 參考書目

- 邱士杰。2009。〈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訊雜誌社主編，頁241-99。台北：文訊雜誌社。
- Castells, Manuel。2003。〈二十一世紀的都市社會學〉。劉益誠譯，夏鑄九校訂。《城市與設計學報》13 / 14 (3月號)：1-20。
- Clastres, Pierre 1987.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Zone Books.
- Evans, Peter B., Rueschemeyer, D., Skocpol, T.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